

台大「出土」的第一位人類學家——李亦園院士

林秀英



台大人類學系的畢業生中有兩位當選中研院院士，一位是張光直，一位是李亦園，今年是李先生入台大的五十週年，本屆畢業典禮中，校長特請李院士來致詞，本刊特刊出李先生的

專訪。

李院士於民國卅七年自福建渡海來台求學，為本校人類學系（時稱考古人類學系）首屆畢業生，專長文化人類學、宗教研究、象徵人類學與華僑研究，發表相關論著二百篇，譽享國際。從學生、助教、副教授到教授，他自承未曾朝夕離開母校。民國五十六年受聘為中研院民族所研究員迄今，七十三年當選中研院院士，同年起於清大人社院任院長，並擔任蔣經國基金會執行長十年有餘。

渡海來台求學，轉眼五十年

民國卅七年，他高中畢業。福建少年，熱血滿腔，但是北方（指的是上海、南京）時局已亂，廈門大學又沒絕對把握，本著「福建人喜歡來台灣的傳統」，同班同學一行十一人，搭船渡海來台考大學，結果，三個人考上台大，他進了歷史系。一年後，大陸為共產黨所據，與家裏音訊全斷，他再也沒回去，算算今年來台剛好屆滿五十周年。

在歷史系第二年，包括李濟、董作賓、凌純聲和芮逸夫等蜚聲國內學界的人類學家、考古學家，隨著傅斯年校長上任，來到台大教書，同年考古人類學系成立。年輕的他如獲甘霖，「在接受教益之餘，已深深地為這些新的科目所吸引」，所以二年級唸完即決定轉系，由於考古人類學系還沒有三年級，遂降轉從二年級讀起，民國四十二年畢業，成為該系第一屆畢業生。

為了轉系，險些失去惟一的經濟來源「獎學金」，幸好傳校長愛才，特別批准才得以保留。每憶起這段師生情，感恩油然而起。



▲1951年攝於台大文學院前。
（李亦園提供）



▲民國四十一年冬，李亦園（右，站立）隨凌純聲教授在花蓮光復鄉太巴塢社考察。（李亦園提供）

談起當年經濟之困頓，李先生回憶「家裏不能寄錢來，全靠獎學金過活。一個月廿三塊五毛錢，必須繳十二元給飯廳包伙，剩下十一塊半買零碎用品，生活很困難，想看場電影，沒錢買票也沒錢坐公車，那時中山堂有免費電影，就走路去中山堂看部免費電影，再走路回學校。我常講一個笑話，芮先生上課總是忘記下課，我們晚了半個鐘頭就沒飯吃，當時台大門外幾乎沒有餐館」。

人類學系第一屆只有他和唐美君先生兩個學生，第二屆是張光直、任先民等三人，第三屆則有丘其謙等三人。由於學生少，師生互動多，關係至為親密。「一方

面老師盯得緊，偷懶不得；另一方面則師生感情很好，老師常常邀請學生去家裏吃飯、聊天，師徒成了一輩子的朋友。直到今天，我們每年都會去李先生、凌先生和芮先生的墓前悼念。」

早年環境單純，所以比現在的學生更專心讀書，除了上課，也參與系裏標本室和圖書館編目整理的工作。入學之初已有成

為專業人類學家或考古家的認知，對於出路，沒有太多掛心，所以讀書氣氛極為濃厚，三班共八個學生當中，日後即有五人以人類學為終生志業。

強調全域學習，基礎最紮實

一九四九年八月，在傳校長的大力支持下，台大成立考古人類學系，當時創系的是主持發掘河南安陽殷墟的李濟博士，師資則來自中研院，有董作賓、凌純聲、芮逸夫、衛惠林、高去尋、石璋如和董同龢先生等人，他們分別在考古學、文化人類學、體質人類學以及語言學領域學有專精，陣容可說是堅強而完整。「再加上日本時代台北帝大土俗人種學及語言學研究室原有的傳統，以及上述兩研究室所遺留下來的豐富考古學、民族學標本及圖書設備」，使得這個新系的研究與教學均極為活躍。創刊於民國四十三年三月號的《考古人類學刊》是台大第一本由一個系獨力發行的學術性刊物；前十屆畢業生四十多人中，有廿餘人成為國內外專業人類學家。（註一）

創系之初，人類學全域（即考古學、文化人類學、體質人類學和語言學四門兼顧）的教學與研究模式即已確立，四十八年來已蔚為傳統。近年雖有符應當代社會的新發展，如婦女、旅遊人類學等等，然這四大基本功課仍為必修。

尤其是他及其後幾屆，四門基礎課程的理論與實務兼修，訓練嚴謹，根基紮實。「我們每一門功課都有實習，文化和考古有田野，體質有『人體測量入門』，由李先生親授。語言學則由台大最早的語言學家董同龢先生主持，得益很多，現在用的記音方法都是學生時代所

習得的」。

還記得有一回實習閩南語記音，他和報導人發生爭論，為董先生責備，其嚴厲可見一般。「實習當天，圖書館資深館員呂碧霞小姐（註二）因為有點緊張，而將『天上的雲』中h音的「雲」說成f音的「焚」，我還跟她爭辯，董先生就罵我說『不可以跟informant（報導人）爭執，他講什麼，我們記下來，慢慢就會發現他不對』；至今想起來還令人玩味十足。

老師們經常發表學術論文，也鼓勵學生寫文章。他第一篇文章發表在台大校刊，是在他四年級時為本校新生所做體質測量的報告；學生時協助整理標本的心得，也發表在《考古人類學刊》，是為台灣首篇關於平埔族的民族學研究。

「那時比較寬廣，四門基礎都有實習。當時一班只有兩人，實習起來很容易；現在一班則有廿五人，只好分成文化與考古兩種實習田野。人多有人多的困難，人少則佔便宜」。

人類學式解構，漢學研究深

專攻文化人類學，一方面出於興趣，一方面緣於體弱。畢業前一兩年染上肺病，後來雖痊癒，但體力不繼，考古田野三天即病倒，遂立意朝文化人類學發展。

畢業後，唐先生去受訓，他則免訓，自然就留系當助教，兩年過後，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成立（民國四十四年），凌純聲先生擔任主持人，他轉而至民族所繼續研究工作。

他自承當時受凌先生影響較大，從研究物質文化起家，以過來人經驗主張學生應從物質文化入門。「我相信文化人類學的訓練不但要做田野，還應該從具體的事物著手，按部就班，比較平順。理由是物質文化的東西具體可見，可以碰觸、測量，學生較能明確掌握研究主題，清楚之後再慢慢進入抽象的領域，其間過程是很有趣的。我帶同學去博物館參觀，他們對於藤籃的編法已經說不出個所以然，你們這一輩學生不再接觸物質文化十分可惜，一個人類學家對博物館多少還是要有概念」。

李院士在宗教與人社會兩個主題研究成就最著，發表的論文與著作無數。據他表示，西元五〇年代他赴美深造，受到指導教授Clyde Kluckhohn和Evon Vogt的啟發，從哈佛大學回來之後，開始進入民間宗教學域，第一篇論文研究菲律賓賓北呂宋島住民伊富高族，後來發表在《民族所集刊》。

漢人社會研究是長期關懷。基於對傳統人類學研究異族文化的反思，他結合社會學、心理學方法進行漢族社

會文化的調查研究，開啓台灣人類學研究漢族之始。西元九〇年代以後，進而深入探究中國宇宙觀與現代企業行為，近幾年轉向氣與傳統醫學關係之探索，深有所悟。「我覺得氣與中醫以個人內在經驗的辦法來感受外在世界的存在，與西方科學實證方法迥異，從研究中我有兩點所得：一是文化人類學強調參與觀察，而研究中國文化則把參與觀察推進到更深層次，如「禪」必需推及內在的體驗才能真正領會中國文化精髓的內涵；另一方面是將追求知識之路拓展得更為寬廣。知識的追求向以西方科學方法為主，其實傳統中國方法也是一個真方法，而這是西方科學無法理解的，換言之，這證明中國文化知識論的存在，中國文化可以對人類知識追求的過程有重要貢獻，雖非主流，至少也是另外一條追求知識的輔助道路」。

原始宗教開講，旋風平地起

民國四十九年學成歸國，第二年起兼任台大副教授，開始授課，五十八年成為中研院與台大合聘教授，雖然七十三年為清華大學創立人文社會學院離開，他說迄今還是兼任教授，未曾真正離開台大。在台大教書廿餘年，開過三門頗具影響力及指標性的功課，其中以開講過八學年的「原始宗教」最受歡迎，「人類學系早期的學生幾乎沒有不上我的課，目前人類學宗教研究學者得益於這門功課的很多，如吳燕和、陳中民、黃樹民、余光弘、林美容、張珣、葉春榮等人，而莊英章、徐正光、許木柱等人的碩士論文也都是我指導，瞿海源雖非本系生，也旁聽了一年。總的來說，人類學式、社會學式的宗教研究可說溯自『原始宗教』這一功課，這點讓

我引以為豪。到民國六十幾年，成為台大很popular的功課，經常一學年都有一百多個學生，包括理、工、醫在內的六個學院都有學生選課。前兩天，有一個農學院畢業的學生從法國回來，要找我聊天，我都不記得他，他提到當年修過該門課，獲益很多」。

第二門課為「應用人類學」，試圖將文化人類學應運於現代社會，建立二者聯繫，也開過四、五回。他表示該門課較專業，雖不似原始宗教般popular，對本系生助益頗多，後來許多新觀念都是從此衍生。

第三門課為「東南亞民族與文化」，約開過三、四次，其中一期同學的學期報告寫得極好，遂集編出書，名為《東南亞民族文化與生活》，頗有意義。

此外，其間有一年曾代芮先生教授「中國民族誌」，也對後來課程有些影響。「芮先生一整年都教少數民族，而我則是半年教少數民族，半年教漢族。由於台大還沒有開始已族文化研究，只能用西方的文獻，當時學者Maurice Freedman的華南宗族與家族專論剛出版，我便援用為教材，現任美國愛荷華大學系主任的黃樹民即上過我的課，他是聞名的漢學研究學者」。

在台大求學五年都拿獎學金，對於母校的栽培一直銘感於心，畢業後這些年，他盡力於教學研究以回饋母校，不負台大。

民國七十三年，他到清大創立人文社會學院，並成立社會人類學研究所，人類學所將於今年獨立成所，經年苦心經營終於有成。「從台大立場來看，我有點叛系的味道，事實不然，我認為有良性競爭，才會更好。清大的發展趨向文化人類學，而台大在考古一直很強，多年之後，平心靜氣想想，大家會感受到這樣的競爭其實很

有意義。雖然我離開台大，到他校另創新系，回過頭來對母系還是有作用，而我現在還是台大兼任教授，目前系裏教授如尹建中、連照美、謝繼昌、崔伊蘭等人都是我的學生，我們經常有接觸，維繫著良好關係；所以說一直到現在，我還是很支持母系的」。

擔任中研院副所長、所長約十年，清大人文社會學院院長六年，中研院總幹事兩年多，以及蔣經國基金會執行長十年，行政歷練合計至少廿五年。擔任行政工作他的惟一原則是一「行政工作時間不超過二分之一，在這二分之一我完全投入，盡心盡力，但最多就是一半時間，另一半則專屬於教學研究，尤其周休二日絕不受干擾。由於我眼睛不太好，不能開夜車，偶有清晨四點多早起，利用到八點多上班前這段時間，補充教學研究之不足」。

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成立於民國七十八年，以獎勵支持世界各國學術機構與學者對中華文化之研究為旨，由於和興趣相近，因此於十年前慨然接受執行長之職，這些年業務往來之外，無形中拓展個人對中華文化的視野是最大的收穫。

最後，這位有豐富學術與人生閱歷的學長勉勵學弟妹們，多閱讀，「要將從書本得到的知識與田野資料相驗證，多讀以後，才知道自己不足之處，就不足再加強；讀才知不足，不讀會妄自尊大」。針對日前大學生為宗

教所感發生的一連串社會事件，他感到很難過，他將以大學生與宗教信仰為講題，獻給今年的畢業生。

註釋

註一：參考李亦園先生〈民族誌與社會人類學〉一文，1983年北大演講。

註二：呂碧霞女士自台北帝大即在母校工作，本刊第六期有專訪。



▲民國四十年冬，台大考古人類學系全體師生合影。坐者左起：宋文薰、芮逸夫、董作賓、李濟、陳紹馨、凌純聲、陳楚光，立者左起：李亦園、張光直、謝劍、任先民、唐美君、林明漢、陶樹雷、許世珍、丘其謙。（李亦園提供）